

宋韵散记

# 紫阳真人与《悟真篇》

## 他中年失业,却因此写下了“神作”

吴世渊 /文 杨辉 /摄

《西游记》第七十一回《行者假名降怪犼,观音现像伏妖王》,说的是观音坐骑金毛犼下界为妖,将紫阳真人金圣娘娘掳去。有一仙人得知此事,恐娘娘遭玷辱,赐其五彩霞裳,穿上后,妖王即无法近身。这位仙人,就是紫阳真人张伯端,书中对他的外形做了描述,“棕衣苦体放云烟,足踏芒鞋罕见。手执龙须蝇帚,丝绦腰下围缠”,一幅标准的道士打扮。他将霞裳收回后,便向悟空道别,飘然而去。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玄奘西天取经是在唐贞观年间,而张伯端出生于北宋,时代相差了三百多年。但没人会揪着吴承恩说:“你怎么把宋朝人挪到唐朝去了?”小说家就是可以任性。

张伯端(984-1082),字平叔,又名用成(诚),北宋内丹学的集大成者,被全真道尊为“南宗始祖”。

张伯端是台州人,这毋庸置疑。《嘉定赤城志》都说了,他是“郡人”。但具体到哪个县,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天台人,因为《悟真篇自序》中,他自称“天台张伯端平叔”。有的说是临海人,因为玉枢子王建章的《历代仙史》《张真人本末》和清代康熙年间的《临海县志》,都说他是“天台瓔珞街人”或“瓔珞街人”。而瓔珞街在临海“府治东北,有宋真人张伯端故宅”。

原本张伯端自戴“天台”头衔,说他是天台人应当没有异议。然而宋元明时期,天台为台州别称,各县人士往往自称“天台某某”。如此一来,张伯端非天台籍亦有可能。

清朝雍正皇帝对张伯端籍贯很好奇,特地派人来实地调查。调查的人写了一份报告,说临海有紫阳故居改建的元坛庙,悟真坊、悟真桥等,绵延数百年,遗迹尚存;天台仅有桐柏宫的一处修炼地点,没有别的传下来。因此,“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

籍贯争议且按下不表。且说生活在北宋年间的张伯端,自小好读书,涉猎儒释道三教经典,像刑法、医学、天文、地理,都有所涉猎,尤其爱好道家学说,喜游山水,慕长生。他曾任儒生的身份参加科举,屡试不第,就到台州官府做个小吏。

基层小吏微言轻,工资不高,好歹能养家糊口。但因为某件事情受到牵连,张伯端工作丢了,还被发配到岭南(南方五岭以南地区)充军。

究竟因何牵连?《康熙临海县志》讲了个故事:张伯端爱吃鱼。有一天吃饭,朋友们捉弄他,把他的鱼藏到了房梁上。张伯端没吃上鱼,怀疑是婢女偷吃了,就去责怪她。婢女当然不承认,竟还以死证明清白。过几天,梁上许多虫子爬下来,原来是鱼腐烂生虫了。张伯端这才醒悟,喟然长叹:我生平审阅公文,却不知积案盈箱的公文里,有多少像“窃鱼”这样的冤假错案。于是,他将手头公文付之一炬。这下闯祸了,按照大宋律例,官府将他贬谪戍边。

县志的记载,有些荒诞不经。“鱼案”非临海独有,如常州等地也有类似故事,只是换了主人公。宋元以来,张伯端的形象日趋繁复,关于他的故事,也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县志的编者只不过将传闻搜集、敷衍罢了。

所有传闻中,因罪发配岭南,是确切无疑的。也因为这次流放,张伯端正式开启了他的修道之路。正如道家所言,福祸相依,有时看起来是坏事,却能变成好事。

宋治平年间(1064-1067),张伯端遇到了桂州知州、余杭人陆洗。两人都好道学,都是浙江人,有共同话题,陆洗就把张伯端招为幕僚。陆洗在哪里做官,张伯端就跟到哪里,途中还不忘寻师问道。



摄于临海紫阳街

在成都,张伯端遇到一位异人(一说是刘海蟾,出自白玉蟾弟子彭柏;一说是青城丈人,出自南宋内丹名家翁葆光),学到了“金液还丹火候之诀”。隔年,陆洗去世,张伯端回到台州,将修炼内丹的心得,著成《悟真篇》。

内丹学,是张伯端道教思想的核心。《悟真篇》的问世,也被看作是内丹理论真正成熟的标志。

道家的炼丹术,素有外丹和内丹之分。外丹,就是用鼎炉炼仙丹,人吃了以后可以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内丹,就是把人体当成鼎炉,以“精气神”为药物,在体内结成金丹。

外丹术在唐代兴盛,许多王公贵族都服用丹药。古人对丹药的化学成分并不了解,所谓的仙丹,实际含有大量铅、汞,吃了容易上火、食物中毒。像唐太宗李世民、宪宗李纯等,均因服食丹药而死。

既然吃仙丹不灵验,反而有害,于是到了唐代中后期,人们慢慢转向内丹。像钟离权、吕洞宾,都是内丹学的宗师。

张伯端极为推崇钟吕二人的思想。他在《悟真篇》中说:“自从钟吕著斯功,尔后谁能继踵?”言语之中,有把自己当成钟吕传人的意思。

张伯端认为,内丹修炼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和炼神还虚。在他看来,人生短暂,生死无常,昨天还街头跑马,今天就躺在棺木中。人死之后,亲人、财产也不再拥有。因而,人要尽快修道,修炼成金丹,以达天人同构之境。

晚唐以降,三教合一逐渐发展成为文化主流。张伯端迎合了这一时代思潮,提出了以道教为本位、以心性为旨趣的“三教合一”思想。《悟真篇》的

自序中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儒释道三教,都是围绕着的终极关怀展开的,他们在生死问题的解决上,可以说殊途同归。只要方法得当,无论从哪一家人手,都可以趋达于“道”。

张氏“三教合一”的思想,对宋元道教乃至后世,都产生深远影响。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创始人、“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在其祖师爷张伯端的影响下,就强调在修炼的过程中,要注重心性的炼养。所谓修道,何尝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向内而足”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你不需要依附于某个强大的存在,完全可以凭借自身修行和精进,获得一个内心自足、自由的状态。

晚年的张伯端,在天台桐柏宫修行。元丰五年(1082),他在百步溪(今属临海)沐浴净身,跌坐而逝,终年九十九岁。据说,在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张家早晨起来,忽见一个道人进门,坐在中堂,就如同这户人家的主人。大家问他张家事,他都对答如流。随后,道人就离开了。人们都说,是张伯端回来了。

这实在是个浪漫的故事。人哪怕云游天外,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清朝雍正皇帝崇道,敕封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御笔亲书《道观碑文》,勒石立于临海县紫阳道观。这块石碑,今藏于临海市博物馆东湖石刻碑林内。

参考文献:《悟真篇》/张伯端《张伯端道教思想研究》/郭建洲、《张伯端及其《悟真篇》诸问题的再检讨》/罗争鸣



摄于临海紫阳街

文化眼

# 斯是书院,犹存古韵芳

应芳露 胡逸年 /文

800年前,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一句“我今送郎桐江上”,让深藏浙东南的仙居桐江书院火速出圈。

朱熹所处的时代,文教空前兴盛,书院蓬勃发展,岳麓、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名满天下,而他却频频将孩子送到今属浙江辖区的书院学习。

浙江的书院,到底有什么魅力值得千里送学?

于何处求学

历史回到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时人称“东南学者表正之师”的方旂,在方氏义塾的基础上,兴建了桐江书院,“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一时文人荟萃”。

书院承袭了湖南岳麓书院的《朱子书院教条》为学规,以道学为开宗之学,设三尺讲台。朱熹、吴芾、王十朋等知名大儒与之都有较深的渊源。在方旂的主持下,桐江书院不仅促进仙居当地人才的培养,又以其学术的独立性,使新兴的理学得到广泛传播。

世事变迁中,桐江书院曾遭兵燹屡次损毁,但方氏一族一次次举族之力修缮重建,成就了当地文脉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美谈。

又过百余年,元兵南下灭宋,毁县学,废科举,文化暗淡。此时,翁森在家乡双庙创办安洲书院,亲自讲学,先后“从学者达八百多人”,临海诗人杨同翁,书法家周润祖,诗人项炳、学者陶德生等名士大儒都曾拜入门下,耕读之风可谓彬彬称盛。

安洲书院由此成为仙居事实上的最高学府。此时读书,与功名无关。它更多的功能是使人明理,传承文化。在此民族存亡之际,翁森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创作《四时读书乐》,盛赞读书之乐,弦歌不辍,高唱“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桐江书院、安洲书院虽处不同时代,却沿着相似的轨迹演进着。它们和浙江历史上存在过的各大书院一起,继往圣、开来学,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卓越人才的培养者、造就者。

一县可窥一省,承载地区文脉的书院,正是浙江千年来文化教育发展的见证者。

“浙学”书院文化

说起浙江,大家脑海中总会闪过: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但浙江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标签”——书院大省。

古时浙江书院,源于唐、兴于宋、沿至清末。据《中国书院史》统计,浙江历史上以龙游九峰书院、金华丽泽书院、杭州万松书院、杭州求是书院为代表的书院共有784所,历时千载,遍及全省。

在全华,由南宋“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常有著名学者受邀讲学,“四方学者皆受业于此”,朱熹长子朱塾带着父亲“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的叮嘱也来此求学教。

在绍兴,北宋宝元元年(1038),还未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越州知州范仲淹,创建了稽山书院。历史上,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儒都曾在此讲过学,而越州“儒学之盛,称于东南”。

数量众多、群星璀璨的古代书院与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顾炎武等鸿儒英才相互成就,形成了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四明学派、浙东学派等。浙江学派开始走向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以书院为基地,延绵办学不绝,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化学术传统,既为一代代浙江学子提供了答疑解惑、改变命运的机会,又承载着浙江乃至江南的文脉,更是催生出了“经世致用”著称、蔚为壮观的“浙学”。

然而,有着千年历史的书院,却随着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纸“书院改学堂”诏令戛然而止。对此,胡适曾惋惜地说道:“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见于今日了。”

虽然书院这种教育形式消失了,但书院精神与书院文化始终都在。

何以重提书院

在古代,书院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时至今日,书院仍是文化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近年来,伴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和人们对现代教育的反思,当代书院在全国各地纷纷创立,并且呈现出不断增长之势,书院教育又重回大众视野。

正在向着文化强省迈进的浙江,让古老的书院重获新生,无疑是一条可选择之路。

然而,许多古代书院遗存还存在自然消亡、保护法规不完善、修复不当等问题,面临着生存危机。

路怎么走?不妨先看看“他山之石”!

与郑州大学合作,新建郑州大学嵩阳书院,逐步形成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个层次的教育培养体系,嵩阳书院在新时代“活”了起来。

与九江学院合作,设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出版《续编白鹿洞书院志》等书,白鹿洞也突破了历史藩篱,“活在了当下”。

山东尼山圣源书院立足农村,针对当地民风民俗的实际状况,从“孝道”这一人们最基本的关注点出发,积极开展“乡村儒学”教育。

取青于蓝,更要胜于蓝,浙江书院发展理应承担走出自己的特色。

书院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应是城市的精神地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书院精神,使得人们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更知道“我将要到哪里去”。

书院既是教育机构,也是文化机构,还是一个可以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空间。可以在承接学术交流、艺术展览、人文教化等活动中,重新编织出贯通经济、社会、人文、交汇现代传统,且极具张力的新文化。

书院有着独具特色的山水景致、文化符号、历史建筑,应与当下热门的文旅行业交流互动、相得益彰,培育文旅消费新IP,可以设置专属景区,打造健康向上的网红打卡地;研发文创产品,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时光流逝,经典永恒。书院必将在新时代下焕发新光彩,润泽大地。

游艺趣玩

# 宦途甘苦境 嬉戏到儿童

## 温岭老人整理恢复旧时博戏“升官图”

黄晓慧 /文 摄

“宦途甘苦境,嬉戏到儿童。捷径青钱里,前程片纸中。交争兼上下,升降倏西东。大抵人间世,凉炎态可同。”这首清人《升官图》诗,咏的是明清时颇为风靡的博戏“升官图”。最近,75岁的温岭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王梓先生用电脑修订整理的“升官图”,让此前从不知有此博戏的笔者,见识了其中一个版本的“升官图”。

这份“升官图”有6张A3纸大,套红制作,方形图框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细看,全图由数十个方框组成,每个方框代表一个机构,如内阁、殿阁大学士、都察院、按察院、布政司、兵马司、通政司等,方框内为各个机构的大小官职,图中间有《凡例》称:“本图之制,悉遵《大清会典》,员备满汉,途别正异。对于大清代之官制升降,有条不紊,诚为工余遣兴之良助也。”以掷四颗骰子的不同组合,决定进退,即“凡掷得双四为德,双六为才,双五为功,双三为良,双二为和,双一为耻,聚四为两德,聚六为两才,聚五为两功,聚三为两良,聚二为两和,聚一为两耻,掷得四、五、六者曰穿花,有品级者作军功,无品级者(为大计项下各条及学政、主政、织造等等)作一才计算。凡掷得四、五、六者又一四(或六或五),作穿花一德(才、功),先行穿花后行德(才、功),起手得此者,同鸿博(荫生)出身……”

整理制作这张图期间,王梓先生还抽空写了一篇文章《大观园·升官图》,回忆接触这两种博戏之缘。王梓先生7岁那年,旧体诗人顾雪奇先生租住城关胡家里,成了他家近邻。那时他常去顾家玩,很快就喜欢上了顾家的“大观园”游戏(他后来查过资料,全称应为《红楼大观园掷点图》,玩法类似现在孩子们玩的飞行棋,玩者根据掷两颗骰子点数多寡按图上的路线前进,谁先克服障碍到达终点谁就是胜利者)。

后来,顾先生又拿出他自己用毛笔蝇头小楷抄写的“升官图”,用的是与“大观园”相同大小的图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那些莫名其妙的名词,整得我头昏脑胀。不要说根本不懂如何操作,就是掷了骰子该往何处去也是一头雾水。这种游戏太复杂,我们都不大熟悉,非得顾先生陪着玩。我就只管掏出手中的四颗骰子,其他一概由顾先生操作。尽管开始有许多不明白,但慢慢也有点熟悉了。很多东西都是日后才知晓的。”

王梓先生认为,顾本“升官图”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明清文官系统图。一张两尺余见方的纸上,写满了明清时期的文官官名,共分为56个大项(以衙门系统为主),333个小项(以具体职称、职务为主),1983种去向,从人仕起到晋升为内阁大学士,直至封爵,完整结局,整个过程中该升迁该处罚,标得一清二楚。一切都是通过掷骰子决定的,参与者手执四颗骰子,只有掷得“对子”,才能赢得出身,才能开始在“官场”上混。“整个游戏以出身为起点,以‘大贺’为结局,参与者期间出任人阁、升降赏罚,趣味无穷。”

王梓先生现在所本的“升官图”手抄图,是45年前向工友杨福福借来抄下来的,并通过顾雪奇和王梓二叔父的逐步指教和订正,才逐步恢复原貌。从前,他还跟尚为孩童的儿子、侄子,玩过这份自己抄制的“升官图”。

如今,他从网络上找到多种版本的“升官图”图片,其中还有用6颗骰子掷玩的。他发现,早期一些“升官图”着法类似于“大观园”(飞行棋),许多只有4种去向,不像顾本有6种去向。“顾本‘升官图’很复杂,应是后期东西。”王梓先生分析说,这个玩意儿当年应该“行”过一时,解放后不再流行了。



相关链接

“升官图”是何时有的?有资料引《谈书录》称:“升官图,今谓之百官图。相传此图乃明倪鸿宝所造。其实官名虽从时,而图戏则自唐已有。”

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曾有报道称,江苏仪征市档案馆内珍藏着一幅或许是迄今官职版本最全的升官图游戏《大清最新文武升官全图》,为我国古代最早“桌面游戏”,也是研究古代职官文化和休闲娱乐活动的重要佐证材料。

作家梁实秋《雅舍小品》中有一篇《升官图》,介绍了民国时一种“换了新装”的升官图,“秀才、举人、进士换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尚书换了部长,巡抚换了督军,而最高当局为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官名虽然改变,升官的道理与升官的途径则一。”关于“升官图”,他也发了一通感慨:“升官图也可以说是有益世道人心,因为它指出了官场升黜的常规。要升官,没有旁门左道,必须经由德行、才能、事功三方面的优良表现,而且一贪赃必定移付惩戒,赏罚分明,毫无宽假,这就叫作官常。升官图只是遵守官常,此外并无其他捷径之类的捷径可寻。假如官场像升官图一样简单,那就真是太平盛世了。升官之阶,首重在德,而才功次之,尤有深意。”